

懷念王了一師

詹伯慧

暨南大學中文系

—

時光飛逝，轉眼進入了九十年代。敬愛的恩師王了一先生離開我們快四年了。記得一九八六年五月五日上午，我們正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舉行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的學術年會，電波中突然傳來語言學大師王力教授在京病逝的消息，在場的一百多位語言學界同仁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噩耗怔住了。一時整個會場瀰漫着沉痛的氣氛。我當即宣佈暫時中斷會議，請與會同人肅立默哀，表示我們對這位在中國語言學界辛勤耕耘逾半個世紀，為建立中國現代語言科學嘔心瀝血一輩子的傑出學者無限敬仰、無限懷念之情。

打那以後，我的腦海裏不時浮現出了一師的音容笑影。他老人家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平素對我們的諄諄教導，他那平易近人、可親可敬的長者風範，卻時刻在鞭策着我們、激勵着我們。我把他老人家當年訪問日本時和我一起在新大谷酒店的合影掛在書桌前的牆上，每當我伏案為文、苦於思索之際，抬頭一見了一師在向我微笑，那神采、那風度，直使人感到如同坐在他的書房裏聆聽他老人家答疑解惑，說古道今，指點我們在浩瀚的學海中如何習水性、迎風浪，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向着光輝的彼岸前進。

—

古往今來，在幾千年的華夏文化中，產生過多少傑出的作家，湧現出多少輝煌的作品。然而，就語言文字這一領域來說，從傳統的語文學到現代的語言學，真正能夠融合中外，貫通古今，不斷開拓語言研究的新問題，堪稱博大精深的語言學家的，又能數上幾人？我想除了我們大家所熟知的「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先生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之外，唯有王了一先生戴得上這頂桂冠了。了一先生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以四十多種專著，二百多篇宏文，著述總字數超過一千萬言的偉大業績，顯示出他驚人的氣魄和非凡的造詣。他的研究觸及中國語言學的各個方面，在語言理論的建立、語言歷史的闡述、語言現象的揭示、語言規劃的擘劃、語言教學的改進、語言知識的普及、語言應用的引導和語言教材的建設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富有開創性的貢獻。王力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劃時代的語言學大師，誠如那部凝聚着四十多位中外著名學者對了一先生無限崇敬之情的《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前言》①中所概括的：「王力教授是適合用『世紀』來計算時間的學者，從事了逾半個世紀的漢語研

究，研究幾十個世紀的漢語，而由他開創的漢語現代研究，以及所得到的成果，肯定會持續和保留至以後無盡的世紀。」八十年代初了一先生訪問日本，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在一篇題為《王力先生》的專題報導中抒發他聽過王力教授學術講演後的感受時說：「雖然他這次是初訪日本，可是他的業績早在戰前已介紹到日本來。凡是對中國有興趣而學過一點中文的人，一定都聽說過王力先生的名字。」「有一位學者帶來一本封面擦得破爛的書，當作寶貝一樣，他說這是他四十年前在南京買到的王力先生的著作，這一本書竟決定了他以後一生的方向。」^②西德有位專攻漢語的研究生，在選擇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時，指導教授一再建議她不必猶疑，就以《王力和他的著作》為題。



《漢語語法史》，
商務印書館，1989年

《龍蟲並雕齋文集》，
中華書局，1982年

《中國語言學史》，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是的，《王力和他的著作》這該是多麼有價值，多麼有份量的題目啊！近十年來，海內外已經有不少學者以這個題目來做文章、寫專論了。了一先生的生平業績以及他那何止「等身」的煌煌大著，已有許多的評述，不必由我這支禿筆來贅述了。作為有幸親炙的門生，只想在這裏略記幾項久久難忘的經歷，以表示我對了一師的深切懷念，也讓讀者從另一個側面來領略了一先生為人治學的道德情操和他那與世長存的高風亮節。

三

了一師一生不離校園，他早年教過小學，一九三一年在巴黎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以後，先後執教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長沙臨時大學、廣西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和北京大學，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專業人材。一九四六年他

書和人

在廣州中山大學創辦全國大學中唯一的一個語言學系，吸引了一批有志於發展中國語言學的青年前來攻讀，我就是一九四九年被吸引而報考的一個。後來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併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立漢語專業，了一師率領全系師生遷入北京燕園，繼續培養、造就一屆又一屆的漢語研究人材。了一師講課認真，言傳身教，一絲不苟，有口皆碑。正如前教育部長蔣南翔在「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週年座談會」上所說：「王力先生五十年來始終在高校擔任教職，他是我國高教界中的一位傑出代表，是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一個典範。」了一師教書育人的突出特點就是既嚴格要求，又親切關懷；既希望學生能學到他傳授的治學方法和學術知識，又希望學生不要墨守成規，能夠有所承傳又有所創新。他不喜歡學生老是背老師的講稿，說老師說過的話，如果學生能夠提出新的見解，他就格外高興。了一師很注意虛心聽取人家對他的著述提出的意見，來自學生、後輩的批評，他尤其重視。他對學生在學習和研究中取得的點滴成績，總是盡量肯定、多鼓勵。對學生的缺點錯誤，總是耐心教育，幫助改正。記得我在中山大學語言學系求學時，爲了學好語言學，沒有選修當時極爲時髦的俄語而改選法語，了一師知道後給我很大鼓勵。我跟着李慰慈教授學法語，有一次試着翻譯了法國語言學家柯恩（M. Cohen）的文章，請了一師指正，沒料到了一師竟逐字逐段地替我修改；爲了鼓勵全系同學學好外語，又把我的這篇蹩腳的譯作交給系辦公室，吩咐印發全系師生參考，使我很受感動，更激發我學好業務的決心和信心。畢業那年我選了《漢字改革》爲題撰寫論文，了一師當即答應做我的導師，熱情地給我指導，還讓我讀他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漢字改革》一書，使我對漢字改革問題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他鼓勵我說：「漢字改革問題非常重要，也非常艱巨，你有興趣研究很好，要多看資料，多思考問題，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來。」一九五三年我從中大畢業到武漢大學當助教，了一師也在翌年隨着「院系調整」到了北京大學。他在北大任教，時刻惦記着我們幾個已經畢業走上工作崗位的中大語言學系學生，擔心我們難以勝任教學、研究的工作，總希望有機會時讓我們能繼續深造。了一師到北大不久，開設了「漢語史」課程，他立即想到我的同窗許紹早君，知道他在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任教，對漢語音韻、訓詁等有一定基礎，便替紹早辦理進修手續，請東北人大允許紹早來北大跟他進修漢語史。嗣後又讓紹早和我們另一位跟在了一師身邊的同班同學唐作藩兄一起協助編寫《漢語史稿》，許、唐兩位在了一師的精心培養下，進步很快，後來他們都成爲對漢語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學者了。一九五五年北京大學漢語專業首次開設「漢語方言學」課程，由袁家驊教授主講。了一師知道我在讀書時代就對方言研究有興趣，爲了讓我能有機會得到方言學方面的專業訓練，便在袁先生面前推薦我去當漢語方言學的進修教師。袁先生欣然接納，我終於在一九五五年秋天，由武漢大學到了北大，有幸跟隨袁家驊教授專攻漢語方言學。原來計劃進修一年的期限屆滿以後，袁師又要我留下來參加他主編的《漢語方言概要》和《漢語方音字匯》、《漢語方言詞匯》的編寫、籌劃工作，讓我執筆撰寫了《漢語方言概要》中《粵方言》和《閩南方言》兩章。這樣一來，我在北大一共呆了兩年半，除了攻習漢語方言學外，並且有機會通過袁師的推薦隨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調查隊到海南島調查黎語，並

研究黎語中的漢語借詞。我在海南島和嚴學窘先生、王均先生，以及同班同學歐陽覺亞兄共事半載，後來發表的幾篇關於海南方言的論文（海南島軍話、萬寧方言等），可算是那次海南調查黎語之行的副產品。一九五八年我結東北大的進修回到武漢大學，從此就把主要的專業方向放在漢語方言上面。可以說，北大進修的兩年半光陰，是決定我人生道路的關鍵。如果沒有當年了一師的提挈和關懷，我那有緣份親炙袁家驊教授，那有機會參與少數民族的語言調查，那能忝為《漢語方言概要》的編著者之一呢！想起這些，我萬分感激了一師，也萬分感激家驊師。

了一師是個大忙人，他除了執教北大以外，經常風塵僕僕地到各地進行學術活動。他每到一處，總是圍上許多仰慕他老人家的人，向他提出種種要求。對於這些有求於他的好學之士，了一師總是熱情指導，不嫌麻煩。他每天都收到一些來自各地的求教信件，儘管再忙，也總要擠時間認真閱看，親自作覆。我們這些他教過的學生，每到北京總要登門拜望了一師，了一師和師母也總要熱情款待，使我們享受家庭般的溫暖。了一師一貫主張語言學必須聯繫實際，必須面向社會。他自己身體力行，常常走出校園，應社會各方面的要求做學術講演，並且親自動筆為大衆、為中小學生寫通俗語文小冊子。例如一九五三年他就為中國青年出版社寫了《字的形音義》，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就接連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虛詞的用法》和《談談漢語規範化》兩本普及漢語知識的書。一九八一年中國語言學會在武漢成立，了一師被大家推舉為名譽會長，此後他老人家總是不辭跋涉地親赴外地出席兩年一屆的中國語言學會學術年會，並且在會議期間為講習班授課。一九八三年夏天，了一師出席在安徽合肥舉行的中國語言學會等等三屆學術年會，會後和著名相聲演員侯寶林遊覽黃山。那時黃山還沒有建索道，了一師以八十四歲高齡堅持徒步攀登。一路上許多旅遊者要他老人家簽名留念，他都一一答應，當場揮筆。一九八五年中國語言學會在昆明舉行第四屆學術年會，了一師和師母仍然遠道蒞會。為了減少他老人家的疲勞，會議安排他只在開幕式上致詞，不必參加分組討論。可是，他老人家並不因此輕鬆多少，那幾天他既要給會議舉辦的講習班講課，又要應付紛至沓來的許多求墨寶的人，好幾回研討會結束，我到了一師住房去請他用膳，看到他仍在房裏揮毫。師母告訴我們：「他這樣寫字比出席你們的會還累。」一九八八年元旦我因公再度訪問昆明時，雲南語言學會的朋友和我談起了一師八五年那次在昆明為各界人士揮毫的事，頗有感慨地說：「那次王老先生為我們雲南寫了那麼多字，實在把他累得夠嗆！我們有幸獲得了一先生墨寶的人都非常感激他老人家，也非常懷念他老人家。他老人家如此隨和，如此關心後輩，絲毫沒有大學者的架子，實在叫人萬分敬佩！」雲南朋友這番肺腑之言使我深為感動。我不免想起幾件我在日本講學期間（1980—1982年）的往事來。

一九八〇年春天，我應聘前往東京大學任教兩年，臨走前到燕南園向了一師和師母辭行，希望聽聽了一師的指示。了一師非常高興，一定要我約定時間，請我到全聚德吃烤鴨，為我餞行。我們在烤鴨宴上暢談了一個多小時，了一師跟我談到了日本漢學研究的悠久傳統，說有機會到日本進行學術工作，對於中國語言學者來說，無疑是莫大的幸福。他要我珍惜這一難得的學術交流機會，邊看邊學邊教，還要我代他向日

本的漢學家致意問好；並且向我表示，他對和中國文化關係密切的日本、朝鮮、越南三個民族很感興趣，抗戰期間他有機會到越南河內研究過越南語，出版了《漢越語研究》，可惜日本和朝鮮沒去過。我領會了一師這一渴望東訪扶桑的心情，是基於文化學術上的「親戚」關係。在我到達日本不久，日本中國語學會為我舉行的一次學術講演會上，我介紹了中國大陸三十年來語言工作的情況，並轉達了一師的致意問候。此後我又在適當的場合向會長波多野太郎教授和藤堂明保、平山久雄等日本朋友透露了一師埋藏在心中多年的訪日願望，希望這一願望能在我居日期間實現。經過多方面的努力爭取，了一師的訪日宿願終於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實現了，那時他已是八十二歲高齡，據說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每年邀請幾百位世界知名的學者和文藝界人士訪問日本，可是，把請帖發出年逾八旬的學者，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王力先生將要訪日的消息在學術界一傳出，立即震動起來，許多人都認為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有的學者既渴望能有機會一瞻王先生的風采，聆聽王先生的宏論，卻又擔心如此高齡的學者遠遊勞累。我為此做了一些遊說的工作，向日本學者介紹了一師的健康情況和工作情況，終於打消大家的顧慮。正因為這樣，日本新聞媒介在報導王力先生訪日時，也特別在高齡上做文章。一家報紙說：「看來這位八十二高齡的學者仍然沒有退隱賦閒，不但繼續當教授，還擔任行政上的領導職務，而且不是空有虛名，而是正在活躍之中。」了一師這次訪日只有十天，他老人家總是渴望能夠充分利用時間，多接觸一些學者，多參觀一些地方。可是，主人為了減少他老人家的疲勞，卻有意少安排一些活動。了一師說既要尊重主人的安排，也要盡可能地爭取多看多訪。當他看到日程表中有觀看歌舞伎的項目時，靈機一動地跟我說：「倒不如就利用這段時間到你家裏來，你安排幾位熟識的學者來你家叙談，我先禮貌式地看它半小時的歌舞伎，然後你來劇場門口接我。」我照着他的吩咐約了波多野太郎教授等幾位學者到我的寓所，然後準備按計劃到劇場去接了一師。不料那天我上課後被幾位學生纏着問問題，沒能準時到劇場。了一師和師母一出劇場見不到我，着了急，自己僱了出租汽車想上我家來；但又沒有我的住址，結果被的士司機載着遊了一陣「車河」，最後只好回到下榻的新大谷飯店等候。我後來到新大谷飯店去，才把老師和師母接到了家。這天晚上了一師因「逃戲」而得以在我客居的斗室中，和幾位日本學者歡叙共飲，無拘無束地暢談幾個小時。他老人家和師母特別高興，啤酒也多喝了幾杯。了一師對在座的朋友說：「這樣的聚會多好，咱們不是像一家人嗎？」「希望有一天也能在我家裏歡迎各位光臨，再一次共叙家常！」了一師和師母在東京我家作客的這段訪日插曲，一般日本學者都不知道，後來我在給香港某報撰寫專欄散文《東瀛雜記》時，特別以「在東京捉迷藏」一節補記在《王力教授在日本》一稿中。

四

了一師一生能為中國的學術發展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自然是他畢生勤奮、孜孜不倦地細心耕耘的結果。然而，他老人家始終保持着一種虛懷若谷的謙遜態度，他常

常對我們說：他能夠有一點學術成就，離不開大家的幫助，離不開大家的共同努力，更離不開師母夏蔚霞的大力支持。有關了一師伉儷互敬互愛，師母在事業上給了一師諸多幫助的佳話，早已在學術界傳為美談。在這裏，我只想補充一點實例。



王力和夫人夏蔚霞



王力(左)與本文作者合照

一九八一年十月了一師偕師母訪日本，正值我在東京大學任教，了一師抵埠那天，我約同東大平山久雄教授到成田機場迎接。隨後幾天我常陪着了一師和師母。後來他倆去京都、奈良訪問，再回東京的當天晚上，我先期到新大谷飯店迎接。王師母一再留我在飯店一起吃晚飯，她說：「王先生交代今晚辭卻人家請的飯，要和你一起吃頓飯，我們請你。」想到第二天清早了一師和師母就要登程回國，難得再有機會暢叙，我也就答應留下來，飯後師母說明天要走了，想到街上買點東西，我就提議陪她去逛秋葉原電器街。我們坐上地鐵出發，一路上師母和我談了許多家裏的事，談到她已作好準備，把了一師多年積蓄下來的稿費捐獻出來設立一個基金會，獎勵對語言學研究有貢獻的人。她還說這個意見要和了一師商量，或許就趁他老人家還健在時就把此事辦妥。從師母這一席話中，我們可以想見她是怎樣一位對了一師的事業多有幫助的「賢內助」了。到了秋葉原，師母給了一師買了個手錶，說他的錶太舊了，也該換上一個。這裏的錶比國內便宜，就給他換個錶作為這次訪日的紀念品吧！師母還說：「今晚要是他自己來，可能就買不成，他總是不肯換新的。」我們買了手錶匆匆回到新大谷酒店，了一師一見面問我們逛了哪些地方，我如實把師母給他買錶的事說了。不料了一師聽了大為不滿，頓時對着我和師母發起火來。他批評我不該陪師母去給他買錶。他說：「要是買錶，也應該給師母買，她比我更需要。」師母一再解釋說：「我看你的錶也太舊了，所以背着你去買，你就要了吧！」了一師聽罷仍然不滿，斬釘截鐵地說：「除非再買一個給你，咱們一人一個，否則我不要這個錶！」我見了一師和師母相持不下，便建議再去買一個，這時已過十點，沒有可能再上秋葉原了，我們只好將就着到樓下酒店的購物中心去，了一師為師母買了一個錶，這樣彼此互贈，才算結一場「風波」。我看到老師和師母都戴上新錶，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喜悅。我把這段「佳話」一直保密着沒有公開，我想，此刻也該可以公開了。

書和人

了一師仙逝我沒能親往吊唁，始終感到內疚。一九八八年秋天我到京開會，抽空約同國家語委陳章泰兄一起去燕南園拜望師母，並和師母一起上西郊萬安公墓拜祭了一師。這時我才得知，原來按了一師對國家的貢獻和他的崇高威望，政府安排將他的靈位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這是中國最高層人士安息之所。可是，了一師在辭世以前卻立下遺言，不進八寶山，要家人在萬安公墓買下一塊雙人墓地，以便讓師母百年之後能和他朝夕相處，同穴共眠。了一師的子女遵照父命，購買了這塊連同師母「生基」在內的墓地，了一師的大公子緝志兄親自設計墓碑，碑石上刻着了一師自己寫的詩。當我和師母來到這塊普通百姓的墓園，佇立在了了一師墓碑前面，看着了一師自己獻給師母的詩刻在碑石上時，我禁不住潸然淚下，了一師和師母在東京互讓手錶的動人情景，反覆出現在我的眼前，這是多麼偉大的情懷，多麼可敬可仰的學者風範啊！

一九九〇年一月於廣州

- ① 《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編，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1987年。
- ② 《朝日新聞》，1981年10月12日。